

歷史中的職場與信仰： 熙篤會與那從未發生過的「修道式資本主義」

（中文撮要）

馬家和

The Providence Capital Group 創辦人

在處境的變遷中不斷自省和更新，從來都是基督教會在歷史洪流中的重要使命。正是因為如此，華人教會在近十年來踴躍地參與了「市場神學」的討論和相關的事工項目，以回應身處香港複雜而多變的國際都市生活。綜觀這個發展的歷程，相信不少同工也會意識到職場事工一向以來是傾向於從個人道德和責任的層面上進深的，並且在這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展望將來，筆者很相信有關職場事工的反省「從微觀延伸至宏觀」的可行性。也就是說，論到信仰與職場的整合，既可以從個人道德行為入手，也可以從較宏觀的社會制度層面上創新，兩者相輔相成。而從歷史的向度探討其中的關鍵，以及當中隱含的契機與鑑戒，是華人教會至目前為止較少進行的研究。

本文取材於十二世紀在西歐曾盛極一時的熙篤會（Cistercian）的一段歷史敘事，作為探討職場與信仰的重點參考。文獻顯示，遠在九百年前，在信仰和經濟領域均具領導地位的熙篤會已經將修道院和資本主義式的企業——兩種現代人看為風馬牛不相及的社會制度——融匯為一。當時這項嶄新制度的產生，對釐定日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性質，不論是市場意識形態還是職場生活形態，都存在難以估

計的潛力。而所謂「修道式資本主義」，則是指這個可能發生但結果沒有發生、真正以基督信仰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它的特點在於內在其中每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單位，本身同時開宗明義是一個追求聖潔的制度化群體（*cenobitic community*）。

本文的第一部分略為交代在熙篤會以先領導修道主義的克呂尼修會（*Cluny*）的興衰史，並藉此讓讀者熟習和一般教會史進路有點不同、略帶有「年鑑學派」色彩的分析。第二部分著重觀察熙篤會的本篤派修道意識和當時社會經濟場景之間的互動如何引發制度上的演化，令修會在有意無意間同時擔當了資本家的角色，在資本主義遠未萌芽的西歐歷史產生舉足輕重的意義。不過，接下來第三部分的分析顯示這個歷史性的契機只是曇花一現，熙篤會未能突破固有的觀念，在時移世易的社會經濟場景中被托钵修會（*Friar*）取代。與此同時，一個獨立而不受信仰價值觀塑造的商業文化正在西歐新冒起的各城鎮中悄然醞釀。如此，十二世紀熙篤會的終結點，奠定了信仰與職場再分割局面的歷史大勢。本文第三部分的末段以及第四部分分別以公會、機構管治和經濟學科發展三方面簡略地印證這大勢的影響。

這篇文章並不是旨在替現今林林總總的職場事工建議甚麼特定的新方案，而只是相信重溫歷史可以提供一片更深更闊的視野。這視野所引伸的並不是一種以社會經濟場景為最終依歸的歷史宿命論，而是以超越的信仰理念在所置身和洞悉的社會經濟場景中作鹽作光。